



Study of Scholars' Painting
During 10th-14th Century

宋元 画学研究

韦宾 著

Wei Bin

宋元画学研究

Study of Scholars' Painting

During 10th-14th Century

韦 宾 著

Wei Bin

甘肃人民出版社

www.gsrmebs.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元画学研究 / 韦宾著.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226-03765-2

I. 宋… II. 韦… III. ①中国画—研究—中国—两宋时代②中国画—研究—中国—元代 IV. J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5973 号

责任编辑:朱满良

装帧设计:马吉庆

宋元画学研究

韦 宾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36.5 插页 2 字数 666 千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978-7-226-03765-2 定价:65.00 元

序
(一)

郎绍君
Lang Shaojun

Preface one

我认识韦宾,是在2004年黄宾虹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时候,后来,他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因为课题研究的关系,我们熟识起来。他为人实在,做学问执著,肯在文献上下功夫,也能够提出与思考问题。他本科时学理工,读硕、博和博士后学习与研究美术史。读书写作之余,还能挥毫作画。《宋元画学研究》是他的出站报告,由一系列有关宋元绘画著述与相关理论思想的论文组成。“画学”二字,延续清代以来对这个词的理解,概指关于绘画的学问,而不是指具有美术学校性质的宋代“画学”机构。

《宋元画学研究》收入的系列论文,对宋元画学文献的考证梳理有相当的突破。作者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收入的宋元辽金的别集和书画著录为主,参考其他相关材料,对七部宋元画史文献的版本、作者、背景、主张等等作了考校。在四库提要、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阮璞《画学丛证》、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他的考校有新的发掘和更加系统的梳理。韦宾知道,四库全书有不少错讹,并不是“理想的版本”,但他认为四库的收录对整体认识这一时段的士大夫绘画和有关思想有“重要意义”。因此,将它们系统梳理、考校是必不可少的工作。《〈益州名画录〉非黄休复作考》、《〈圣朝名画评〉纂撰者考》、《〈图画见闻志〉文献考》、《〈宣和画谱〉名出金元说》、《宋元画学文献的剽袭与“言公”问题》等,对这些著名文献的作者、成书时间、材料来源以及转抄问题等等,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求证和见解。薛永年兄在韦宾出站报告答辩会上说,“有些研究纠正了自古以来的错误”,是恰当的评价。作为一家之言,这些考证、判断和提出的问题,还要

经过历史的检验，但说它们是继四库馆臣及近代学者宋元画学文献研究而后有价值的
新成果，并非过誉之词。

除了文献考校之外，《宋元画学研究》还收入了作者关于宋元画史与画学思想的论
文。《宋代王维作品的作伪现象》、《宋元画史中士大夫画家与画工比例》、《宋元士大夫擅
长肖像者考略》、《“诗画一律”与士大夫的话语权力》等，从社会学的角度讨论画史问题，
这是美术史界较少关注的领域；《墨戏考》、《宋元隐逸文化与画隐》、《幻住的清净身》、
《李公麟的佛教信仰与画禅》、《元代复古思潮与绘画》等，对宋元绘画的思想背景、士大
夫画的理论根基作了考察与剖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

韦宾用“整体观”概括他采取的研究方法。从目录即可知，他的论文涉及文献、文化
根源、社会基础、表现形式、绘画思想和个案六个方面，不待说，这需要多方面的功底，多
方面知识的支撑，需要把考据与义理、知识和思想的互渗与整合。这固然是一种方法，同
时也是一种能力。当代文化研究，社会学、人类学和艺术史学研究，都在向着综合的、跨
学科的方向发展，把平面的方法转变为多层次、立体化的方法。当然，单向度的专业研究
如文本研究、图像研究等等，仍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但兼具两种能力，掌握多种方法，
无疑是有力的。

韦宾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疑问和假说。从这些疑问和假说，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强
烈的问题意识。研究要有问题，有问题才能研究，这看似平常的道理，并不容易做到，这
需要文献上的根底，更需要发现问题、提出假说并进行求证的能力。在韦宾的论文中，关
于“诗画一律”说的提出，逸格的演变，宋代王维画的作伪，士夫画与隐逸思想的关系，
《益州名画录》的作者是不是黄休复，《宣和画谱》是不是成书于宋代等等，都在文献考校
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和看法。一个重要问题的提出，会带出一系列相关问题，如
《益州名画录作者考》，除论证几位作者的可能性之外，还涉及到逸格提出的时代环境、
逸格观念的演变、人们对这种演变的不同理解等。有了这些问题，就会带动深一层的材
料挖掘与相关思考。历史和旧的东西打交道，从旧东西里发现新东西，才是历史的研
究；但只有对旧的东西熟悉了，同时有了发现问题、比较联想、思考推断的能力，才可能
使问题清明起来，成为学术上的“解决”。

韦宾不擅辞令与交际,但能够守独处静,可以一个人整天坐在电脑前,不被任何外界的热闹干扰。在充满喧嚣,弥漫着浮躁气、江湖气、投机心理和空玄之风的当下学界,能有这样的学术品质与素养,是难能可贵的。

2008年5月2日于南望北顾楼

韦宾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培养的第一个美术学博士后。他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宋元画学研究》，曾受到薛永年、郎绍君等中国美术史专家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已顺利通过答辩出站。

韦宾在从事中国美术史研究的青年学者中以治学勤奋严谨著称。在当今人心浮躁的时代，学术界也流行空疏浮泛、哗众取宠的浮躁风气，像韦宾这样清心静虑、专注一境的苦行僧式的学者实属罕见。正是基于这种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他的《宋元画学研究》才取得了超越前人的突破性成果。

我认为，韦宾的《宋元画学研究》至少有以下三个学术创新点：

第一点，韦宾是第一次对宋元时期的士大夫画在文献学上进行综合性整体研究。他主要从文献学的角度研究宋元时期的士大夫画现象，为此他首先辛苦搜集了大量传世文献资料，包括文渊阁四库全书宋元时期别集近六百部和全部书画著录，也包括宋元时期的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论著等相关资料。他在这一研究领域搜集的文献资料，比迄今为止的学者们搜集的资料更为丰富、系统而全面，并能把这些涉及宋元时期的绘画思想、表现形式与当时的社会基础、文化根源的文献资料综合起来进行研究，体现了一种综合艺术学、社会学、哲学、文化学研究的整体观。而时下不少所谓学者，却懒于辛苦的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工作，游学无根，空发议论，或者仅仅凭借一点儿零星的资料就大做文章，难免以偏概全，如何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第二点,韦宾重视考据方法,重视义理与考据的结合,把义理分析建立在考据基础之上。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就非常重视考据和实证,并认为由考据兼顾到义理是学术研究发展的轨迹。清儒把学问分为三门:义理、考据、辞章。考据大盛于清朝乾嘉时代,乾嘉学派的大师使我们读懂了以前无法读的古书。考据方法的精髓就是无证不信(参见季羡林《我的学术总结》)。在忽视考据、空谈义理的当今学术界,韦宾对乾嘉学派和前辈严肃学者的考据方法的重视和继承本身,就是一种学术坚守和创新。他关于《益州名画录》、《圣朝名画评》、《图画见闻志》、《宣和画谱》等宋元画学文献的翔实考据和系统清理,是在四库馆臣、余嘉锡、余绍宋、阮璞、谢巍等学者以后,对宋元时期画学文献研究的重要突破。他根据严密的考据得出的结论,“有些纠正了自古以来的错误”(薛永年评语)。他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义理分析也比较透彻,特别在有关宋元时期的士大夫画的理论背景、墨戏现象、隐逸文化、“画禅”思想等方面的义理分析颇有创见。

第三点,韦宾能够坚持独立思考,富有怀疑精神和问题意识。没有独立思考就没有怀疑精神,没有怀疑精神就没有问题意识,没有问题意识就没有学术创新。有些走考据路子的人往往缺乏问题意识,为考据而考据。而韦宾的考据是为了说明他的问题。他好学而深思,好古而疑古。正如宋儒张载所说:“学则须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经学理窟·义理》)韦宾能在司空见惯的文献资料中发现问题,这种独立思考、大胆怀疑的精神非常难得。他在《宋元画学研究》中基本上都是以问题来组织篇章,整个结构,六个部分,都属于问题研究,特别是他对《益州名画录》、《宣和画谱》、《图画见闻志》等有名的文献,都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辨伪证伪,从驳论中立论,在辨伪中求真。这可能是继承了胡适、顾颉刚等现代中国学者的实证主义治学传统,大概也受到了波普尔、库恩等现代西方学者的科学哲学的影响。坚持独立思考和怀疑精神,善于发现、提出和解决问题,对问题进行科学的理性分析,是当代学者最可宝贵的学术素质。

王镛 2008年4月26日

序 (三)

Preface three

张晓凌
Zhang Xiaoling

韦宾的《宋元画学研究》是在他出站报告《宋元士大夫画研究》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这部书稿，可以从资料搜集、文献研究、义理研究三个方面来看。

在资料搜集方面，《宋元画学研究》是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宋元时期的士大夫画现象进行的整体性的研究，这首先要求作者尽可能全面掌握这一时期相关的材料。作者在材料选取上基本以文渊阁四库全书宋元时期(含辽、金)别集近六百部，及四库著录的宋元时期书画著作，及此一时期相关史学材料为主，酌情参考其他相关材料，构成此书写作的主要内容。这项工作，迄今为止，应该是对相关传世文献第一次进行全面搜集。当然，作者还未来得及对明清以后有关宋元时期此类文献著录进行挖掘，这个工作尚须在以后的时间补充。从版本上看，四库全书本并不是最理想的版本，但对于们能够全面、整体认识这一时间段的士夫画却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在文献研究方面，《宋元画学研究》中《益州名画录非黄休复作考》、《圣朝名画评纂撰者考》、《图画见闻志》文献考、《宣和画谱名出金元说》、《宋元画学文献的剽袭与言公问题》等有关这一时期画学文献的专题研究，是对于画史上非常重要的画学文献的清理。这些研究是在四库馆臣、余嘉锡、余绍宋、阮璞、谢巍以后，有关这一时期画史文献研究最重要的突破。

在义理研究的方面，《宋元画学研究》很注意将义理研究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上。《宋元画学研究》虽然在一些相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也有所突破，比如有关宋代王维作品作

伪现象的研究、宋元画史中士大夫画家与画工比例的研究、宋元士大夫擅长肖像者的研究、“诗画一律”与士大夫话语权力关系的研究等,但在学术史上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则是报告中有关士夫画理论背景的研究。作者通过对墨戏等现象的研究,和对士夫墨戏画与士夫正规画现象的分析,在对隐逸文化与画隐关系考察以及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提出“画禅”思想是士大夫画的理论基础,这个看法非常重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有关禅宗与尚理风气关系的论述,有关隐逸文化的论述,比如提到士阶层在元代出现的由“修齐治平”向“修身齐家”的转变,对于宋明理学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不仅仅限于美术史的范围。

近些年来,由于古籍电子化工作的进行,尤其是电子版《四库全书》的出版,以往一些难以见到的古籍普及开来,使更多的人有条件从事中国古代学术的研究。韦宾很早就注意到古籍电子化成果在研究中的应用。我们知道,有些治古代学问的,往往对于电子技术心存反感。对于这种现象,韦宾有一个明确的观点,那就是,学术首先在于研究问题,而不是展览学问。他善于利用古籍电子化的成果,结合传统考证的精神,作了一些踏实的工作。《四库全书》使他初步了解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治学特色。博士毕业以后,他又受古史辨学派疑古精神的影响,大胆地对画史中一些重要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虽然还要受历史的检验,但这种实事求是,重视考据,又提倡疑古的治学态度,毫无疑问是要得到肯定的。

2008年8月18日

自序

Author's Preface

——谁来任『道』？

韦宾
Wei Bin

发生在北宋中后期的王安石变法，不仅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变革，而且是江南文化开始占据中国主流文化的标志。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期。从现存重要的画史著作来看，在熙宁之后，士大夫之参与绘画，已具有广泛的规模，而到南北宋之际，士大夫画家在人数上已与专业画家持平，且在其后，大有超越之势，这是其一。其二，则是士大夫画家一开始就涉足各个绘画领域，并且在专业技巧方面毫不逊色于专业画家，丰富和发展了绘画技法，使画工的画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提升。其三，在北宋中后期，士大夫始自觉地寻找适合自己的绘画语言，这个情况首先出现在花鸟画领域，其次在山水画的领域。这一时期的转折，奠定了南宋、元乃至明清的绘画格局。在元以前，画工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留下理论性的文字，他们主要以口诀相传。绘画的理论是士大夫创立和完成的。对于绘画而言，宋元时期的士大夫画家不但努力使绘画摆脱了下贱的“工”的性质，而且赋予了它以深刻的文化内涵，而这也必然以士大夫的价值观为指归，使得绘画与书法一样成为高雅的艺术。这是就其在绘画史上的意义而言的。

而就其在士的历史中，这种士广泛地参与绘画活动的现象，也引来了一些焦虑的声音。僧法秀即批评李公麟说“伯时为士大夫，而以画行，已可耻也”^[1]。这个批评今天看来过于迂腐，然而这里却有其对于士大夫“任道”角色的焦虑。对于“士(大夫)”而言，他们的职业是“任道”，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不应沉溺于画工之技。但是，正是熙宁而后，这种放弃“修齐治平”的正业，转而沉醉于画工之事的士却日益见长，这反映

了此一时期士大夫在任道问题上日益转向内向的自省，处在一个以隐逸文化为核心的内向性转向的过程。由于这种转向，士大夫由“修齐治平”转而向“修身齐家”乃至向“修身”的内向性的方向发展，这也必然是一种宗教性的转向。这种转向的外在压力，正与士之不足以任道，士风堕落导致社会风气败坏有关，因此在士的内部也出现两种应对士风堕落的思潮，即理学与隐逸哲学。

将道德建基于所谓的“理”的基础上，而以“理”来论证道德先天存在的理学，决无深刻之哲学性，而是一种应对士风堕落的思潮。它的意义不在于空头的理论说教，而在于践履，而元人于此尤为可敬。在宋元鲜活而堕落的社会生活中，理学显得过于迂腐和不通人情，又未免走入另一极端，流入空谈心性。然而，我颇同情其遭遇。而道德实践之先天依据决无从在哲学中找到，则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在中国历史上，士之无耻亦何以成常态，遂使欲以“道”自任者，亦只能退守其身，转向修身与宗教追求，此隐逸文化所以兴，而王夫之所以谓：“君子之道，仕者其义也，隐者其常也。”^[2] 而元代隐逸亦有谓“士无求用于世，惟求无愧于世”^[3]，可谓最真实的说明。

假此以推究士大夫画的文化根源，则即是在此一文化背景下道德自全的修身哲学，围绕此一哲学而形成迥异于画工画的独特的绘画哲学，便是有关画隐的理论和对画诀、画论的理学提升。另外，由于隐逸哲学的影响，那种内圣外王或者修齐治平的儒家观念转向对内心的自省，而佛教思想乃适其时地影响到绘画理论，并与“兴”的思想相结合，最终形成画禅思想，宋元时期正是这一思想的萌芽期。所有这些，决定了士大夫画的文化归属和独特性，而绘画艺术从众工之技转而被赋予宗教与哲学的深意。

今天，士大夫阶层已经消失，“道”亦失去其担当者。士所以存在，乃是因为“道”需要一个担当者，士(大夫)则假此而形成四民社会中的特权阶层，而任道的问题显然不是某个社会阶层可以承担的。士之所以消失，乃在于历史证明士不足以任“道”。“士”不足以任“道”，而并非“道”不足任，“道”必然有其践履者。今日之世，新型的知识分子虽然与古代的“士”有本质不同，但是从其作为社会各阶层中的知识阶层来讲，仍然与古代“士大夫”有类似之处，然而今天的知识分子显然又不是“道”的担当者。在物质生活的领域，“道”的缺失或许无足轻重，因为一切只需要技术即可。但在精神文化的领域，“道”的

缺失则使此一文化显得轻薄、肤浅、短视，没有历史的穿透力与人格的震撼力，而文化亦将因此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近来在学术界有所谓国学问题的争论，在画界则有笔墨问题的争论，黄宾虹现象的争论。在我看来，这些现象与对 20 世纪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反思有关。更重要的是，它有其现实的意义。艺术直接呈现了文化的深度。面对当前日益繁荣，然而意欲高而未尝不鄙的绘画创作，如何认识、理解、评价、学习中国传统学术，尤其是它的精神，是一个必要的问题。

儒家的道德理想，与宗教境界相通。而后世以小人儒多、君子儒少，上以利禄诱天下之士，而士亦遂竟进于无耻之途，至于近代而自掘坟墓。破坏旧的传统，并不意味着将能建设一个新的好传统。虽然儒家的道德实践最终以失败告终，却留下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如果这种信仰在人欲横流的时代，还有一点意义，那么，以道德文化为核心的国学，就须被重新估量，士大夫画的价值，就须被重新审视。

2006 年 10 月 21 日于新源里

[1] 宋释惠洪撰《冷斋夜话》卷八《李伯时画马》。

[2] 《宋论》卷十四《理宗》，续修四库全书本。

[3]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十三《故临川处士吴仲谷甫墓志铭》序引吴氏言。

目 录 >>>
CONTENTS

卷一 文献研究

- 《益州名画录》非黄休复作考——唐宋南北宋时画格内涵的转变 / 3
《圣朝名画评》撰、摹者考 / 37
《图画见闻志》文献考——以卷一“假面舞女图”为例 / 51
《宣和画谱》名出全元说——对“宣和画谱”与徽宗绘画思潮关系 / 61
《宣和画谱》对以前文献的点窜曲解 / 91
《画继》引诗与南宋诗画一律观念 / 103
《图绘宝鉴》文献考 / 127

卷二 文化根源研究

- 宋元隐逸文化与画隐 / 143
“辋川”造象与熙宁后的文化转向
——王维佛教哲学与造像与江南文化的展开 / 186
元代复古思潮与绘画 / 212
宋元陶潜崇拜与绘画 / 225

卷三 社会基础研究

- 宋元画史中士大夫画家与画工比例 / 245
宋元士大夫擅长肖像者考略 / 280

绘画与两宋士大夫的生活 / 289

宋元政治生活中的绘画与士大夫 / 304

卷四 表现形式研究

北宋中后期品画风尚转变与题材的关系 / 333

宋元士大夫善画题材统计 / 341

墨戏考 / 360

墨竹与宋元士大夫 / 369

墨梅与宋元士大夫 / 385

“米氏云山”的意义 / 395

卷五 绘画思想研究

“诗画一律”与士大夫的话语权力 / 409

尚理风气与两宋画论的理学提升 / 422

佛教对宋元士大夫绘画思想的影响 / 447

卷六 个案研究

韩愈《画记》对宋元士大夫的影响 / 475

宋元画学著作的割裂与“言公”问题 / 491

宋元画史失载士大夫画家考略 / 507

李公麟的佛教信仰与画禅 / 517

幻住的清净身——倪瓒书画流境兼蓄根脉图 / 531

参考文献 / 551

跋 / 565

卷一 文献研究

PART ONE: Study of the Documents

《益州名画录》非黄休复作考

——兼论南北宋间逸格内涵的转变

《圣朝名画评》撰、纂者考

《图画见闻志》文献考

——以卷一《叙图画名意》为例

《宣和画谱》名出金元说

——兼论《宣和画谱》与徽宗绘画思想无关

《宣和画谱》对以前文献的点窜曲解

《画继》引诗与南宋诗画一律观念

《图绘宝鉴》文献考